

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游记》^①论

——以芥川、章炳麟的会晤对谈为中心

◎ 魏大海

摘要：近年来，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游记》受到学界广泛关注，研究者基于各不相同的立场与视角，对这部非小说性的名作进行了分析和解读。本文拟从空间、时间功能性或特定时段历史文化背景的角度，对“游记”中芥川与中国文化名流章炳麟会面时的著名对谈做出进一步探究。

关键词：中国 游记 中国蔑视 空间与时间 章炳麟 功能

一

芥川龙之介(1892—1927)生于东京，本姓新原，号“柳川隆之介”“澄江堂主人”“寿陵余子”，俳号“我鬼”。出生后9个月，其母精神失常，遂被送至舅父芥川家做养子。芥川家为旧式士族家庭，特殊的氛围对其日后的生命历程和文学生涯皆有很大影响。芥川龙之介中小学时代的读书经历或阅读范围包括江户文学、《西游记》《水浒传》以及泉镜花、幸田露伴、夏目漱石、森鸥外等近代日本文学巨匠的作品。1913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英文科；1914年同丰岛与志雄、久米正雄、菊池宽等两次复刊《新思潮》，促进了文学新潮流新思潮的传播。短篇名作《罗生门》(1915)、《鼻子》(1916)、《芋粥》(1916)等的发表，确立了其新进作家的地位。1917—1923年先后出版6部短篇小说集，题名分别为《罗生门》《烟草与魔鬼》《傀儡师》《影灯笼》《夜来花》和《春服》。芥川龙之介的文学创作始自历史小说，后转向明治时期的文明开化题材，最后则是现实题材的小说。

1927年7月24日，芥川因健康、思想压力等多重原因在自家寓所服安眠药自杀，时年35岁。一般认为，“芥川的自杀”与日本的社会文化状况相关。当时的日本文坛无产阶级文学迅速兴起，追求“艺术至上”的芥川龙之介感受到强烈的时代躁动与不安（“恍惚的不安”），神经过度敏感，怀疑自己小说的艺术价值。文友菊池宽、久米正雄逃向了通俗小说，而芥川苦于无法效仿。他曾这样表述了自己的心中苦闷：“我所期望的是不论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都不应失去精神的自由。”

芥川是20世纪初日本“新思潮派”最重要的作家，集新现实主义、新理智派和新技巧派文学特征于一身，代表了当时日本文学的最高成就。此外，他发展了日本的短篇小说文学类型，借鉴、吸纳了西方现代小说的结构样式，打破了“私小说”单一、消极的写实性创作模式，强化了日本现代小说的虚构性。芥川龙之介在现代日本文学中确立起独特的

创作方法和文学地位。另外在 20 世纪以来的日本文坛,其影响力不仅体现在“芥川文学”本身的文学价值上,也体现在“芥川之死”包含的文学史分期的象征意义上(日本现代文学起始之象征)。“芥川之死”对当时的日本社会 and 日本文坛,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有人谓之为“北村透谷第二”。日后确立的一年一度延续至今的“芥川文学奖”,也长期发挥着奖掖和推动日本纯文学的重要作用。“芥川奖”是日本现当代文坛最具影响力的纯文学大奖。

芥川龙之介最为重要的文学成就在小说。样式上看,芥川小说擅长的是类似于江户、明治时期历史小说的特殊类型。早期名作《鼻子》刊于《新思潮》,获夏目漱石高度赞赏。《鼻子》的特征在于以现代小说的创作方法,将日本古典《今昔物语》第 28 卷中的特定故事及《宇治拾遗物语》中一段相似的故事,以简素的语言实现了再创作。短篇名作《罗生门》亦为同样类型的历史小说,出处同样是《今昔物语》。据日本文学史论家西乡信纲的说法,《今昔物语》原本的相关描述朴素而简单,显现为一种没有思想性虚饰的原色调,芥川却给那般“存在”增添了人类的“认识”与“逻辑”,芥川的历史小说通过生动的故事虚构探究了相对抽象的观念问题。另一部历史小说代表作《地狱图》的模板则是前述《宇治拾遗物语》。《地狱图》也被称作芥川龙之介“艺术至上主义”的一个宣言。类似的历史小说名作还有《枯野抄》《孤独地狱》《忠义》《基督徒之死》和《戏作三昧》等。

芥川的历史小说还有一个重要特征。一般认为森鸥外的历史小说是尊重史实的,芥川却以近代式的理性或精神自由随意地解释历史或披着历史的外衣描写现实性主题。有观点认为芥川的历史小说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小说,而是卢卡契所谓的“历史现代化”或“历史的假托”。

芥川龙之介又被称作日本最后一位富有东方文人色彩的文学大家。在当代日本文学评论家柄谷行人的《日本近代文学起源》中,说到某种“反文学”志向(“私小说”)促成了日本“纯文学”的形成,“私小说”作家对于“透视法式的装置”或超越论似的意义缺乏清醒的自觉,也没有那般自觉的必要。相反,对此具有明确自觉意识的却唯有晚年开始厌恶结构式写作的芥川龙之介。柄谷行人认为重要的并非芥川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文学动向的敏感,不在其有意识地创作那般“私小说”,重要的是芥川结合了西欧的动向与日本“私小说”式的作品,使此类“私小说”式的作品作为走向世界最前端的形式具有了意义。^②柄谷又说,“私小说”作家无法理解芥川的那种视角,谷崎润一郎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私小说”作家以为他们是在自然地描写“自我”,与西欧作家的所为一致。芥川看到的却是“私小说”具有的“装置形态”问题。芥川的观察基于无中心的、片段的和诸多关系的视点。^③

芥川小说的中文译介最早见之于鲁迅、周作人编选的《现代日本小说集》(商务印书馆 1923 年版)。鲁迅最早翻译了《罗生门》和《鼻子》。1927 年开明书店出版了鲁迅、方光焘、夏丐尊翻译的《芥川龙之介集》,《罗生门》和《鼻子》仍采用鲁迅的译本。夏丐尊翻译了芥川若干中国题材的小说,如《南京的基督》《湖南的扇子》等,同时翻译了芥川的非小说类作品《中国游记》。

二

研究者对《中国游记》趋之若鹜,评价却多具批判性。例如邱雅芬的《上海游记——一个隐喻的文本》这样写道:“对《中国游记》尤其是《上海游记》的误读,使阅读了《罗生门》《鼻子》《河童》等名作,充满兴趣刚刚步入芥川龙之介文学世界的中国大学生读者,突然堕入了茫然不知所措的感觉中。”邱也提到一个事例,在中国大学教授日本近代文学的田口律男曾述及自己在中国教书时的体验。他的文章题名为《在中国讲授日本近代文学时的奇妙扭曲》。他说自己的教育经历伴随了残酷的挫折感——自己的许多学生在撰写毕业论文时,是以芥川龙之介的中国体验或中国理解为主题的。但是他们细读了芥川的《中国游记》,却为文章中比比皆是的“中国蔑视”所激怒,最终,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无法忍受而堕入忧郁或嫌恶的情绪中。^④

这里述及的是中国读者阅读《中国游记》的一般性反应。邱雅芬在结论中表现了理解的态度——应以宽容的、包容的态度接纳芥川那般歧视性描述。邱也在论文中述及鲁迅的一个表态。这个表态与巴金的反论近似——到中国来的日本学者及文学家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固有观念。当他们遭遇不同于其固有观念的事实时,几乎一味地表达厌弃或一味地采取回避态度。所以他们来不来中国,并无任何的差别。^⑤

鲁迅的表态值得关注。当然,中国学者对《中国游记》也有肯定的观点。译者陈生保就提道:“芥川龙之介的那般记述,正是包含着中国憧憬的真实的表现,因而,即便触及了太多阴暗面,仍应表示理解。”这个说法触及的也是不同性质的另一问题。必须实证性地考察事实上究竟有无“中国蔑视”,作家的表现究竟体现了何等心境?或在当时中国、日本相互关联的文化氛围中,究竟体现了怎样的历史本质?陈生保又说,“《中国游记》阴暗的负面表现,原因在于当时中国政治体制、经济状况、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相对落后,也关联于军阀战争、内外矛盾、民众生活困苦等诸多方面。鉴于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虎视眈眈的态势,芥川的那般表现便自然刺伤了中国文化人的自尊心,自然地引起了他们的反感。”这个说法基本没问题。他又说:“游记中存在过多负面描写是事实,但是他也确实客观地记述了半殖民地时代中国的真实状况。因而一味地表示反感没有意义。……当时日本正急切加入资本主义列强队伍,芥川突然由那样的日本来到半殖民地中国,其中国憧憬与现实之间或理想与体验之间,便理所当然地产生了强烈的反差。就是说芥川自幼憧憬古代中国的文化、艺术,当他突然面对当时中国的那般现实时,巨大的失望难于言表。……我们中国或我们中国人应以大陆式的宽广胸怀接纳芥川的那般表现。”^⑥

其实,前述中国的“中国游记”论,很大程度上也受到日本学者相关论述的影响,虽然日本学者对“游记”多溢美之词。佐藤泰正在其《芥川龙之介论》中就这样说——在这里,芥川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媒体人天分。他的记述中随处可见的是讥讽,那正是一个文人作家辛辣的记述视角。关口安义是日本著名芥川文学研究专家,其论著《特派员芥川龙之介——在中国所见所闻》(1997年版)可谓芥川“游记”研究的经典。书中的主要观点如下:首先,芥川与中国的关联乃是芥川文学研究中的一大课题。到今天为止,在很长的一

段时间里,对于这篇《中国游记》的评价都是负面性的。许多评论都在强调,芥川的健康状况在此次中国旅行中受到了损害。多半论者的基本论调是芥川来到激变期的中国旅行,却并不关心那里的政治与社会。关口安义则认为,芥川自幼年少年时代养成的对于中国文化的关心或修养,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他称芥川龙之介正是一位杰出的记者。其次,中国西洋化的都市上海给人的感觉不过是西洋的变种罢了。在龙之介的认识中,大众花园给人以怪异之感。他说龙之介不过以贴切的言辞(对那般都市化现象)诉诸了批判而已。关口安义表示,芥川龙之介与章炳麟的会晤对话十分重要,给人深刻印象。他说“章炳麟先生堪谓贤人。还没听说过哪位日本通,像咱章太炎先生那样朝着桃中出生的桃太郎射出一箭。……先生这一箭竟比所有日本通的雄辩,包含有更多的真理”。^⑦

问题是,关口安义似乎并不关心芥川与章炳麟对话中抵牾的实际内容。关口安义一味认定,“游记”中的表现正是记述者芥川龙之介透彻目光捕获的现实的中国。日本学者中明确持否定意见的是白井启介的“有眼不识泰山”论。他在著书《芥川龙之介——知性空间》序论中引用了中国谚语“有眼不识泰山”。他描述说,“泰山”是中国古来天子即位时举行祭天地仪式的圣山,“芥川理应看到的東西没有看到,便是‘有眼不识泰山’。在这种问题意识启示下,重要的不仅在于芥川看到了什么,而是他忽视了什么。芥川恰恰忽视了一个发展中处于摩登都市剧烈变化之过渡期的、新开发中的大都市上海”。^⑧白井的观点颇具启发性。他指出福州路河南路交叉口距福建路二百米的路途中,聚集了中国有代表性的出版社如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中间福州路山东路交叉的一段称作望平街,区区五十米的街区又汇集了申报、时报等现代新闻社。以福建路为界,东侧是作为上海新闻媒体据点的文化街,西侧是娱乐街。芥川触及的只是娱乐街。到头来……芥川龙之介并未看到上海这座城市未来发展为现代都市的萌芽——忽视了它的消费生活、娱乐文化还有出版文化,忽视了这个摩登都市未来的发展前景。^⑨

有趣的是,巴金也曾论及这部作品。他说:“我对之惟有反感。……龙之介笔锋犀利,教养高雅,除此之外还有什么?除了形式,内容何在?他所有的作品只能以‘虚空’二字形容。”巴金又说:“艺术家真正的重大使命,是表现与人类相关的主题。”^⑩关口安义却说:“巴金的日本批判或芥川龙之介批判,相对意义上说没有错。但与此同时,芥川在芜湖唐家花园露台上的现代中国批判亦有重要的意义。芥川对历史悠久的中国热爱有加,充满期待,所以才牢骚满腹。我感觉遗憾的是,巴金竟没有容纳龙之介的雅量。……当然我们必须了解,巴金的文章刊于龙之介死后七年半,那时中日关系已变得十分紧张。”^⑪

的确,在认定芥川那般表述真实含义的过程中,理应考察它对应于怎样的历史文化背景或时空条件。那么巴金何时阅读了《中国游记》?1927年,开明书店的《芥川龙之介集》已翻译、出版了《中国游记》《南京的基督》和《湖南的扇子》等作品。巴金应当知晓或阅读了那些作品,但当时并未发表见解。原因或许正如关口安义所言,与后来中日关系的剧烈变化相关。众所周知,1935年巴金发言的历史背景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的4年之后。此时日本军部、右翼势力的不断强化,当局的镇压对付的不仅是共产主义者,也开始波及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1935年的“天皇机关说”(针对明治宪法的新解释)事件,使自由主义学说和思想受到排斥,开军部政治之先河(军部拥有了更大的权力)。1935

年是1937年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前夕。在两国关系新的历史背景下,巴金没了度量是自然而然的。正是到了这个严峻的时期,巴金才痛切地感觉到日本知识分子那种有害的文化倾向。

三

芥川龙之介的“新艺术家眼中的中国印象”,乃是作者关于《中国游记》的说明文。其中有如下一段表述。“中国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随处可见的滚油炸鸡或赤条条将生猪吊挂在树上剥皮。在中国,自古以来便有各人自由屠杀动物的习惯,我讨厌那种习惯。它使一般的中国人不知不觉间具有了某种残忍性。”^⑫

又如:“湖心亭^⑬……一个中国人正悠悠地朝着池塘小便。陈树藩^⑭反叛也好,白话诗的流行将要熄火也罢,日英续盟^⑮的话题甚嚣尘上也罢,这个男人全无兴趣。至少从他的态度和表情上看,他有着悠闲的心境。阴暗的天空下矗立着中国风情的亭榭,蔓延着病态绿色的池塘,斜刺里哗哗地一注小便泄入池塘,——那景观不仅像似一幅充满忧郁爱情的风景画,同时又是咱老大古国的辛辣象征。”^⑯这是相关研究者经常引用的一段描写,形象生动而有趣,却自然而然地引起了中国读者的反感。在那样一个特异的时空条件中,对于白话诗之类话题,普通民众也好知识分子也好,更多想到的或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遑论一个湖中小便人。不考虑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负面的描述自然令中国读者生出反感。其实前面的表现还算真实生动。他又说,“现代中国已非诗文中的中国;而是猥亵、残酷、充满贪欲的小说中的中国。……那些除了文章规范^⑰和唐诗选^⑱以外对中国一无所知的汉学趣味,在日本可以休矣。”^⑲这也是芥川龙之介真实感受的表现。但在特殊的历史时期,这种表述自然会在中日两国间发生负面作用。

此般貌似自然的感觉,也在芥川与中国文化名流章炳麟的会见会谈中清晰展示。下面是岩波书店1996年版《芥川龙之介全集》第8卷的引用。

章:那边的赤瓦白瓦可都是西洋式建筑,西洋人的建筑还是不错的吧?

芥:什么呀,西洋人的建筑不堪入目。至少在我看来,比比皆是下等建筑。

章:你这么讨厌西洋,我可是做梦没有想到呀……

芥:我不是讨厌西洋,而是讨厌恶俗。

章:当然,这一点我也是一样的。(这是真话)

芥:胡扯。你讨厌和服爱穿西服。你讨厌日式居宅爱住西式木屋。^⑳你不吃日本汤面爱吃意大利通心面。你不喝山本山^㉑日本茶却爱喝巴西咖啡……

章:我明白了。可是,那些墓地——静安寺路〔现在的南京西路〕的西洋人墓地还是不错的呀。(章氏已很不愉快,但继续着同样的话题)

芥:墓地同样不值一提。当然,那处墓地修建得还算精巧。但是让我选择的话,我才不愿意睡在那种大理石的十字架下面呢。我宁肯横卧于土馒头之下。谁能忍受那种奇怪的天使雕刻?

章：那么，你对上海的西洋毫无兴趣喽。

芥：不对。我很感兴趣呀。正如你所言，说到底上海的一面正是西洋哪。好赖且不论，在上海看到西洋不是件有趣的事情么？只是这里的西洋，在没有见识过西洋的我的眼中，自然有种不合时宜的感觉。^②（笔者自译）

芥川与章炳麟充满错位的对话十分有趣，包含了太多的潜台词或文化背景内容。近代以来的中国、日本历史文化背景紧密相连却又有着很大差异。那么在涉及“西洋”“近代”“进步”等一系列核心概念时，在两国知识分子有机会进行对话或争论时，是否总会自然而然地出现观念或认识上的龃龉或对立呢？显而易见的是，对话常常给人不平等的感觉。从章炳麟的真意上讲，真的认为那种不合时宜的西洋是进步的象征么？芥川是在否定近代西洋等同于进步的基准或理念么？其否定与当时日本的社会文化背景有无关联性？芥川的应答唐突失礼，为什么？反正芥川始终像似一个评判者，章炳麟却成了被评判者。

四

中日甲午战争是近代日本体验的第一次对外战争。这场战争的胜利，构成了日本近代史上的一个决定性契机。同样，在日本的历史著述中，日俄战争也是近代日本历史上与甲午战争同等重要的一次重大契机。日俄战争胜利后，日本仿佛真的变成了世界“一流强国”，日本人的所谓“日本人意识”也以明确的形式确立下来。正是这两场战争的胜利，促使之后的日本不断地挑起新的战争。所谓日本的“日本人自我意识”，正是在亚洲确立了鹤立鸡群的优越感，其次是意图名正言顺地在大陆获取殖民地，作为资本主义国家入伍世界列强。年号改“大正”的1912年前后，也是日本近代史上一个奇异的重大转折点。此时爆发了世界史上前所未有的世界战争，19世纪以来的国际情势至此骤变。如前所述，令亚洲国际情势发生巨大变化的是甲午战争，它终止了大清帝国最后的繁荣，之后不久，中国便沦陷于列强瓜分中。而此前人们印象中的小国日本，却凭借甲午战争的胜利，基本消除了西方列强之于日本的压力，确立了加入帝国主义列强的国家立场。

但日俄战争后的日本，市民和农民的生活却较战前恶化，国债和增税使他们不堪重负。在此前后日本也出现了经济危机，将日本拯救出危机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正三年（1914）七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八月二十三日，日本对德宣战。翌月出兵青岛。十一月初占领青岛。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对日本的影响是空前的，日本人将之称为“天佑日本”。日本以此大战为契机加入了帝国主义强国的行列。诸产业跃进，更使日本的资本主义体制达到高潮。日本开始称霸东亚市场，资本输出步入正轨。大正时代也是一个复杂的时代，大正民主主义也是一大时代特征。同期，大正思想界的左倾化亦具象征性。大正九年（1920）年末至大正十年（1921），出现了战后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日本也没置身局外。此外大正时代日本立宪政治的发达也值得注目。明治四十年（1907），日本的义务教育由4年延长为6年。小学校的就学率，步入20世纪后已超过九成，几乎消除了文盲。

相反,在同时代的中国,如章炳麟所言,“根据如今中国的人口总量来推算,能识字撰文者不过百分之二,而研习汉学者不过百分之二中的千分之一。”^②这种同期不同地域空间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的全面差异性,构成了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的写作背景。因此,日本作家包括芥川龙之介,在面对中国的作家、文化人时,毫无疑问会有某种下意识民族优越感。这是无人能够回避的历史现实。

日本岩波书店昭和四十年(1965)出版了特辑《座谈会·大正文学史》。主题是“时代·文化氛围或知识分子的共通性”。特辑中上原专禄^③提道:“自日俄战争以来,日本的资本主义发展一直没有停下脚步。……而帝国主义阶段日本资本主义的真正发展,说到底源自第一次大战。就是说,当第一次大战中的欧洲各国忙不过来时,日本作为协约国一方参与了战争,乘欧洲列强无力顾及中国,企图独占中国市场。”^④上原专禄又说:“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界,日本资本主义的确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同时,日本也对中国采取了十分强硬的政策。一言以蔽之,第一次大战使日本经济的发展方式或日本经济的体质发生了变化。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大众生活影响很大,换做今日的话来讲,那种发展意味着产生了某种所谓的‘经济余裕’。就是说这种状况意味着,文学、艺术乃至学问都获得了容许其自由发展的经济条件。此外与明治时代不同的是,大正期形成了产生自由主义、人道主义作品的社会与经济基础。”^⑤

这一点,中国与当时日本的情况恰恰相反。应当说,至少在芥川的潜在意识中,这样的一种历史文化的前提是存在的。

猪野谦二^⑥则说:“毋宁说,明治的民族主义乃是不自觉地卷入大正帝国主义的一个过程。总之这个过程亦可归结为一个方向——对于帝国主义的极端无意识的认可。而到了这个阶段,以抽象的欧洲形象为中心,所谓享受近代的层面一如往常,然而没过多久便到了昭和期,矛盾日益显露出来。……例如芥川等人曾去中国,日后写出《中国游记》和《南京的基督》等作品。然而他却不曾感同身受地关注生机勃勃的中国人的生活。上海的那般殖民地氛围,在他眼里不过是一种异国情趣。”柳田泉也说,芥川“看到的并非富于生命力的中国”。^⑦

对近代中国而言,20世纪初前后最为重要的历史背景,同样也是中日甲午战争的战败以及《马关条约》的签订。清末中国无可忽视的状况是,满铁经营构成日本帝国主义满汉政策的轴心。诸多事件昭示了当时中国的悲哀处境——日英同盟修订、新的日俄条约、日韩合并、美国要求开放满洲、俄国觊觎蒙古、英国觊觎西藏……的确多灾多难。此外军阀混战,人民生活困苦,处于长期的黑暗政治之中。以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为契机,中国的情况似有好转。第一次世界大战降低了来自西欧的压力,中国的国民经济也曾获得了相当的发展,工厂剧增,近代银行数量也大大增加(由1911年的7家增加为1919年的57家)。不过钢铁和煤炭等重工业部门仍旧受到列强尤其是日本资本的挤压。日本的在华纺织业,此期间也获得了显著的发展。总之日本政治对中国的压迫日益增大。

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激发了中国人的变革行动。1905年,以广东派孙文的兴中会、湖南派黄兴的华兴会、浙江派章炳麟的光复会为核心,结成了中国革命同盟会。1911年10月10日(辛亥8月19日),武昌新军的下级军官和士兵打响了第一枪,仅4个月时间,

结束了延续 268 年的清王朝的专制统治。民主革命获得成功,建立了亚洲最早的共和制国家——中华民国。但这场革命却被孙文称作“有民国之名无民国之实”。在 1908 年清末的宪法大纲《清鉴纲目》中有如下说法,日本区区三岛战胜强俄,当时的舆论多归功于立宪。专制不如立宪说传于天下。这些皆为当时的时代性文化背景。但这里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情况,章炳麟对康有为的西洋式立宪论却持批判态度。在 1899 年 5 月 20 日的《清议报》第十五册上,章炳麟刊文“客帝论”,主旨在于强调戊戌变法时期的思想在于必须满汉合力抵抗白人的侵略。经历了义和团事件后,他则阐述了自己新的认识,不排满便无法抵御欧美的侵略。“(在义和团事件背景下)倘不驱逐满人,我们的土地就将被白人分割。此乃吾等神州的莫大耻辱。”^⑧在此时的章氏眼中,光绪皇帝是世上的贤明客帝。“然而不驱逐满人,民族大义将尽皆受阻,革命志向也将尽皆消灭。……若不驱逐满洲,士之爱国、民之敌忾,皆无可能。唯有益趋衰弱,最终沦为欧美的陪隶(奴隶的奴隶)。”^⑨这里可以窥见章炳麟氏反帝、反殖民主义的基本立场。

结 语

事实证明,中日甲午战争前后,日本确曾出现过高涨的“中国蔑视”风潮。……福泽谕吉即在《时事新报》明治二十九年(1897)一月八日撰文“胜兵马战者亦可胜商战”,称中国“何止没有纸币制度,连货币的用法亦不知”云云,“称之为野蛮人之迂阔亦不为过”。^⑩铃木贞美认为福泽谕吉的此般言说无礼。福泽谕吉逝世于 1901 年,时段上与龙之介的《中国游记》并不一致。但“游记”中的相关表现与福泽谕吉歧视性、蔑视性的言语有何分别?铃木贞美又说,或为时代风潮之反映,甲午战争的胜利使日本比之其他亚洲国家率先掌握了西方文明,产生了某种基于优越感的自信,进而渐渐地强化了轻视汉文的倾向。^⑪基于这般历史描述或历史事实,可以认定时代性的“中国蔑视”是存在的,那是中日甲午战争以来两国文化历史氛围或现实背景差异性与关联性的反映,而不是读者的误读或虚构。

当然分析游记整部作品,芥川的“中国蔑视”与当时日本国内一般性的“中国蔑视”有着明显的差异。芥川毫无掩饰地表达了自己对于当时中国陋习、中国落后的失望,另一方面又对传统中国表现出恋慕或向往。芥川与章炳麟文化冲突的原因,尚牵涉到两人精神状态的差异。两人的文化姿势显然不同。芥川龙之介信守自己的行为规则,即便失礼,他也必须诚实地表述或表达自己真实的、发自内心的感觉或认识;相反,不愧为中国文化名士的章炳麟却老辣得多,他并非简单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而是不断地提出一些言不由衷的问题,用以试探日本人作家芥川龙之介的文化、政治立场或现实反应。作为革命家的章炳麟没理由喜欢西洋的殖民,也没理由喜欢恶俗中不合时宜的西洋。

最后,依据胜本清一郎的看法——菊池宽的小说是与现实社会连接的……这一点芥川却不同,芥川的文学与现实社会没有关联。但这并不意味着,芥川的文学对现实社会全无反映。胜本清一郎说,“芥川触及现实社会的方式是一种十足的精神态度”。^⑫这个说法颇具启示性。芥川《中国游记》中表现的“中华崇拜”也好“中国蔑视”也好,在与章炳麟的会晤对谈中,或有另一层含义值得深究,即在特定时段、特定异域都市空间产生的真实感

受描写,会发生何等功能性深层寓意改变或变异?另外他去了哪些城市?与哪些人见面、会谈?分别有怎样的感受和描述?我们知道,芥川此次中国游,并未见到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鲁迅,《江南游记》部分两次附带提及胡适,在北京见过胡适却也没有写入游记。除了章炳麟,芥川还在北京见了清朝遗老郑孝胥,崇奉备至不乏溢美之词。芥川龙之介到了新的都市空间,接触了种种在日本没有接触到的事象,并依照自己真实性的创作原则,如实地记录了相关感受。尽管给中国作家巴金和诸多文化人留下“中国蔑视”的感觉,事实上,蔑视或许并非其本意或者说形似神异。湖中小便、手巾擤鼻和京戏名角的甩鼻泡,任何人都是一样的感触。一些结论性的意见表述,明确体现了芥川对当时中国否定性的态度。芥川未必考虑到现实性的负面功能。回到与章炳麟对话的焦点,龙之介喜欢北京而鄙夷上海。北京经历了辛亥革命的洗礼,晚清遗老遗少还在,旧时传统文化风气犹存,芥川喜欢;上海则是当时亚洲欧化最快、最典型的现代化大都市,芥川却排斥。这种对比或反差别具意味。他显然喜欢传统的中国而不喜欢异化后的中国。这种文化态度显然在日本形成,同样适用于日本。他的“中国蔑视”与当时日本的风气有关联也有差异。在当时日本的政治、社会环境下,直接拿日本的事象说事是有风险的。那么彼时的上海异域空间别具功能。芥川在与章炳麟的对话中下意识地唱对台戏,凸显了相关的历史文化问题,即肤浅的、不合时宜的欧化风气在日本同样时兴且已有了显著发展。即便如此,肤浅的不合时宜的欧化仍是有害的。这或是芥川根本的文化态度。芥川龙之介并未就日本殖民的问题表态,他显然维持了触及现实社会时十足的精神态度,正如其历史小说通过生动的故事性虚构探究相对抽象的观念问题,或如柄谷行人所言——芥川的观察基于无中心的、片段的和诸多关系的视点。

注释:

① 这部游记的日文题名原为《支那游记》。“支那”起源于印度。印度古代人称中国为“chini”,据说是来自“秦”的音译,中国从印度引进梵文佛经以后,要把佛经译为汉文,于是高僧按照音译把chini就翻译成“支那”。同为印欧语系的古罗马称中国为Sinoa,后来的英文中的China和法文中的Chine都是来自这个语源。此语具有歧视之意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支那”一词在日本开始带上了战胜者对于失败者的轻蔑的色彩。1913年又根据驻华公使的提议商定:日本政府今后均以“支那”称呼中国。对此引起了很多中国人的愤怒。因“支那”一语带有特殊的、歧视性的历史印迹,国内的几个中文译本都将题名译为《中国游记》,这样就出现另外一个问题,人为抹去了原本用词的特殊含义。

②③ 柄谷行人:《近代日本文学的起源》,日本讲谈社文艺文库1988年版,第225页。

④⑤ 邱雅芬:《上海游记——一个隐喻的文本》,《外国文学评论》2005年第2号,第75页。

⑥ 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陈生保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6、14、16页。

⑦ “僻见”,刊于《女性改造》1924年3月9日。

⑧⑨ 关口安义编集:《芥川龙之介——知性空间》,至文堂平成16年发行,第135、136页。

⑩ 巴金“几段不恭敬的话”,《太白》第一卷第八期,1935年1月5日;《点滴》1935年4月。

⑪ 关口安义:《特派员芥川龙之介——在中国所见所闻》,第136、137页。

⑫ “新艺术家眼中的中国印象”,岩波书店《芥川龙之介全集》(第八卷)1996年版,第3页。

⑬ 上海共同租界内莲花池中央,开业于1885年的二层清朝建筑。

- ⑭ 陈炯明(1878—1933),军阀。1920年拥孙文组织广东军政府。1922年政变逐孙文,北伐受挫。
- ⑮ 1902年日英结盟,1920年日本政府通过外交交涉谋求延长盟约。但英国担心日本侵入满洲,在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上废除了盟约。
- ⑯⑰ 《上海游记》,《芥川龙之介全集》(第八卷),岩波书店1996年版,第19—20页、第23、24页。
- ⑱ 科举范文集,七卷,南宋末谢枋得编。室町末期传到日本,用作作文练习之范本,对日本汉学影响很大。
- ⑲ 唐诗选于江户初期(1590年以后)传到日本。
- ⑳ Bungalow(英语)意为“印度地方民居、木造建筑”。
- ㉑ 东京日本桥有名的茶店。创立于元禄三年(1690)日本桥路二丁目。创立者是宇治出身的山本嘉兵卫。
- ㉒ 《芥川龙之介全集》(第八卷),岩波书店1996年版,第35、36、37、38页。
- ㉓⑳㉑ 西顺藏·近藤邦康编译:《章炳麟集》,岩波书店1990年版,第124页、第30页、第32、34页。
- ㉒ 上原专禄(1899—1975),历史学家、思想家,因基于严密资料的批判性研究得名。
- ㉓⑳㉑㉒ 柳田泉、胜本清一郎、猪野谦二编:《座谈会 大正文学史》,岩波书店昭和四十(1965年版),第11、12页、第16、17页、第21页、第426页。
- ㉔ 日本文学史论家,著有《新编日本文学史》等。
- ㉓⑳ 铃木贞美:《日本“文学”概念》,作品社1998年版,第176、238页。

(魏大海,男,1953年9月16日出生,籍贯江苏兴化,1984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硕士学位,现任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文化研究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日本文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中外语言文化比较学会理事。研究方向是日本近现代文学)